

目錄

導 論	左聯研究的現狀及突破的可能	1
	一、偏重組織史的左聯研究綜述	2
	二、左聯組織史研究的可能性	8
第一章	左聯籌建的政治宣傳動因	13
	一、批判“假馬克思主義”——左聯籌建的直接動因	14
	二、從左聯報刊看左聯前期的批判主旨	22
第二章	魯迅何以加入左聯及其與早期左聯之關係	33
	一、“革命文學”論爭之外——魯迅與中共發生關係的另兩條 線索	34
	二、哪位中共領導促成了魯迅與革命文學家結盟？	52
	三、風起於青萍之末——魯迅與早期左聯盟員之關係	63
第三章	左聯成立前中共的文化組織實踐	71
	一、回憶錄中的早期知識分子支部建設	72
	二、文化黨團和文化工作者支部的建立	77
	三、上海閘北區早期知識分子支部變遷考辨	81
	四、知識分子支部向街道支部的轉變	87
第四章	左聯籌備及其領導機關	95
	一、左聯籌備及其小組	96
	附：左聯是在 1929 年底成立的嗎？——對馮潤璋回憶的辨析	106
	二、文委	109
	三、文總	121

左聯研究的現狀及突破的可能

第五章 左聯組織系統演變考述	127
一、左聯行政系統及研究部門	128
二、左聯黨團	138
三、左聯組織機構及相關人員遞變彙考	143
結 語	155
附錄一 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大事年表（1927-1931）	161
附錄二 20世紀30年代初期左翼與右翼的國家形象書寫之爭	193
參考文獻	215
後 記	228

一、偏重組織史的左聯研究綜述

左聯研究一度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鎮，且擁有專門的研究機關——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¹然而左聯研究的冷熱起伏也十分顯著。民國時李何林即開始著意搜集整理左聯資料，並用唯物史觀的眼光加以批評闡釋，所持立場與魯迅相近。²相關文學史著也多半會論及左聯，但多是對左聯文學活動、文學主張的概要介紹。總體來看，對左聯的評價傾向於肯定和讚揚，但對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評價，則有逐漸降低的趨勢。³新中國成立後相關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進一步拓展。左聯自然也成為文學史的重要論述對象，魯迅所代表的左聯一翼，獲得高度關注。20世紀60年代初，湧現出左聯研究的一次高潮。一方面是對左聯文學和思想的探討，如南京大學中文系編輯出版了論文集《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⁴；另一方面，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如丁景唐、瞿光熙編有《左聯五烈士研究資料編目》⁵，上海文藝出版社組織人力整理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重印了20種左聯刊物及近20種同期其他革命文化刊物，保存了大批左聯資料。但政治鬥爭和文壇風向的不斷變動已經對研究產生深入影響。“文革”時，左聯在很大程度上成為30年代“文藝黑線”的產物，研究自然停滯；但此一時期各種革命組織對“黑線”的深挖及對相關當事人頻繁的內查外調，仍為後來的研究留下了諸多

材料。比如近年披露的《馮雪峰外調材料》，便包含不少左聯回憶資料。¹惜乎這類材料，目前可以利用者還不多。“文革”後，已屆高齡的左聯盟員紛紛發表回憶文章還原歷史，有力帶動了研究興起。整個80年代的研究在史實輯考和理論溯源等方面有突出成績，如丁景唐、瞿光熙、陳漱渝、周國偉、朱正、陳子善等對左聯盟員和組織的考察，張大明和艾曉明等對左聯理論資源的發掘等。此一時期還出版了多部側重左聯研究的論文集。²雖然此時段的研究對象多為寬泛的30年代左翼文學，而相對較少左聯專項研究，但因廓清了左聯的基本輪廓，仍堪稱奠定了左聯研究的基礎。港台學者也有突出貢獻。香港學者王宏志以左聯的組織結構及其與魯迅的關係為研究重點，台灣學者周行之則側重政治史的視角，梳理了魯迅與左聯及中共之間的分合，二人於1991年在台灣出版了各自的左聯研究專著。³進入90年代後，隨著社會思潮的多元化，研究迅速落潮，僅在左聯成立的周年紀念活動上有應景式活躍。在2000年左聯成立70周年的紀念會上，與會專家皆以“冷清”來形容左聯研究的狀況，痛感左聯研究“人才凋零”，“專門從事‘左聯’研究的人越來越少，最有學術能力的學者目前幾乎無人以‘左聯’為專門的研究課題”。在研究成果方面，左聯會址紀念館的張小紅在寫作左聯研究綜述時備感“傷心”，“寫作過程中她查閱了近20年的學術期刊，發現關於‘左聯’的研究論文非常少……20年來，公開發表的關於‘左聯’的論文不過30來篇。進入90年代以後，1992年、1993年還有一些——這是因為1990年紀念‘左聯’成立60周年的餘溫，可是到了1995年以後，關於‘左聯’的專門論文就很難找到

1 本書所討論的“左聯”，專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上海總部，不涉及左聯各地分盟。

2 李何林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1917-1937》，上海：生活書店，1939年。

3 比如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傑成印書局，1933年；王豐園編著：《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北平：新新學社，1935年；李一鳴：《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上海：世界書局，1943年。這幾部文學史著，都對左聯設有專門章節。

4 南京大學中文系編：《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60年。

5 丁景唐、瞿光熙編：《左聯五烈士研究資料編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年。

1 馮烈、方馨未整理的《馮雪峰外調材料》（上、下），載於《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1期和第2期，兩期一共刊載了約四五萬字，而據編者說明，馮雪峰“文革”時期外調材料總計達50多萬字。

2 具體書名和篇名參見書末所附參考文獻。

3 王宏志：《思想激流下的中國命運：魯迅與“左聯”》，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年；周行之：《魯迅與“左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了。”¹ 這一描述基本上是準確的。直到近十年來，左聯研究才有重新活躍的趨勢，探察視角開始趨於細密，並出現多部研究專著。如姚辛對左聯史料的系統發掘辨析（姚辛的左聯研究起步很早，但其《左聯史》2006年才發表），汪紀明對左聯組織機構的考辨，孔海珠基於新發現《文報》的左聯研究，張小紅對左聯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研究，左文、陳紅旗對左聯期刊的研究，朱曉進對左聯政治文化的研究，王錫榮對左聯成立和組織系統的詳細考察，等等。

日本學者對左聯研究也有不少貢獻。中國左翼文學研究，向來為日本中國文學研究之重鎮，其中自然涉及左聯處甚多；但是專門的左聯研究（尤其偏重左聯的組織和制度），日本學者似沒有太多論及。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谷一郎、近藤龍哉、蘆田肇等編輯出版了輯刊《左聯研究》，前後共出版了五輯（1989-1999），在東京左聯、北方左聯以及左聯籌建等方面有精細研究。

左聯研究雖已獲得重要進展，仍存在有待深入探掘的學術地帶。突出的表現集中於兩方面。一，目前的研究還大體集中於左聯內部，幾乎完全沒有突破內部研究的視角，未能將左聯與廣闊的政治環境聯繫在一起。而大量史料可證，左聯是高度政治化的團體，左聯自己也反覆宣稱其並非作家的同業組合，其領導成員及政策的幾經調整，皆和共產黨的政治活動有直接關係。史家便注意到：“他們（指左聯——引者）所形成的一個又一個決議，特別是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政治任務的規定，幾乎全是對中共中央文件的摹寫。”² 然而，對左聯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親密關係，至今罕見細緻梳理。史學界研究此一時段黨史被大量使用的若干大型叢書，左聯研究由於受文學研究範式的制約，極少利用。反而是史學界已有學者使用與左聯相關會議檔案史料進行政

1 祝曉風：《“左聯”研究陷入停頓》，《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15日。按，張小紅所查找的“左聯”研究論文當指以“左聯”為論述核心者，而非指泛泛的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研究。

2 楊奎松：《中國近代通史》第8卷《內戰與危機（192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頁。

治文化史研究。因為缺乏了必要的外部參照系，左聯研究缺乏取得突破的支撐，對左聯的組織機構和運作方式因此不能獲得更深入的認識。二，目前的左聯研究對數量巨大的左聯回憶資料，缺乏細緻的辨偽與考證。20世紀70、80年代之交集中出現的左聯盟員回憶，由於回憶者年事已高等因素，其中的細節存在大量含混與抵牾，研究者常莫衷一是，但未見太多細緻的甄別考辨。正因有上述缺陷，導致對左聯諸問題的探討，常陷入疑團而難獲推進。最突出的表現或就是左聯的籌建及組織形態至今面目不清。

其實，以上兩方面的缺陷彼此關聯，其克服亦需齊頭並進：將左聯置於具體政治史的脈絡中考察，不能不大量運用相關左聯回憶資料，而具體考辨左聯回憶資料的真偽，又不得不廣泛採用歷史實證文獻。本書便致力於以左聯的籌建和組織系統為研究中心，在以上方面有所突破。

既有的左聯組織和制度研究雖然已有不少成果，但就利用史料的廣泛性和發掘的深度來看，尚較為薄弱。對左聯組織機構所做的考察，立論還基本限於左聯自身。對此一問題做過較專門研究的學者主要有王宏志、周國偉、姚辛、張小紅、張大偉、汪紀明、王錫榮等。王宏志曾做長篇論文《“左聯”的組織與結構》探討這一問題，大致理清左聯組織結構的輪廓，但所採用的史料主要集中於《左聯回憶錄》，所採取的也主要是靜態剖面式研究，對左聯六年間的組織變遷涉及相對較少。因其創作於20世紀80年代，對90年代初期又公開發表的許多左聯回憶資料自然也未能加以利用。周國偉對左聯的實證層面也有考證，論文《“左聯”組織系統史實考》廓清了許多迷霧，但該文僅約五千字，雖則提綱挈領，所論範圍畢竟有限。姚辛是專攻左聯研究的學者，對左聯的幾乎方方面面均有系統研究。作為一名家境貧寒的普通工人，他憑藉對左聯的熱情，數十年自費奔波全國各地尋訪左聯史料，撰成包括《左聯詞典》和《左聯史》在內的共計數百萬字的左聯研究著作。¹ 雖然令

1 對姚辛事跡的概述參見陳蘇：《姚辛：生為左聯》，《嘉興日報》，2011年1月28日。工人姚辛對左聯的激情，也折射出左聯的底層訴求所內蘊的超越時空的精神能量。

人敬佩，然而也不必諱言，姚辛作為民間學者，因為缺乏足夠的學術訓練，導致其左聯研究常常熱情有餘、而專業性不夠，過多的情感判斷常掩蔽深入的學理探討。自然，姚辛在左聯史料整理方面的貢獻仍然堪稱巨大，由於其自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來便親自訪問了 90 多位左聯盟員，而這批盟員已基本辭世，所以他於 2011 年的去世無疑是左聯研究的重大損失。在左聯的組織制度史研究方面，姚辛亦有梳理考辨¹，但還基本限於若干具體史料，而缺少系統性的鑒別和歸納。左聯會址紀念館張小紅的《左聯與中國共產黨》是在政黨背景下系統考察左聯的專著，也有專門的章節處理左聯的組織結構問題²，但該著亦屬扼要，長於輪廓梳理，而疏於資料勾稽與辨析。以左聯的組織結構為研究重點的博士論文目前亦有兩篇。一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張大偉的《“左聯”文學的組織與傳播（1930-1936）》（2005）、一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汪紀明的《文學與政治之間：文學社團視野中的左聯及其成員》（2010），兩篇博士論文均已成書出版。³其中張著以傳播學和行政管理學的視角切入左聯的組織和傳播研究，以一章的篇幅梳理左聯的組織結構，對左聯的內部組織和上級領導機關，分條縷析其功能和變遷。但問題在於面對史料分歧較少辨析、引證史料的來源同樣多限於《左聯回憶錄》，因而未能有更大突破。汪著也意識到左聯盟員的回憶矛盾重重，於是援引黨史資料作為參照，於是開拓了左聯研究的視野，其對左聯組織結構的考辨因而具有了較強的突破性。但其中仍存在許多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其原因一是由於該著對左聯盟員的回憶相對忽視、似因畏難而卻步；二則由於該著固然注意到了左聯的政黨特性，但面對面目曖昧的左聯組織機構，卻忽視中共的組織規章以及社聯、劇

1 參見姚辛：《左聯史》，第 2 章第 1-2 節，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第 6-12 頁。

2 參見張小紅：《左聯與中國共產黨》，第 2 章第 3 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8-85 頁。

3 分別為張大偉：《“左聯”文學的組織與傳播》，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年；汪紀明：《文學與政治之間：文學社團視野中的左聯及其成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聯等左聯兄弟社團的組織規章，而採用殊少政治色彩且誕生於數年前的《創造社會章》作為對比參照，相關論述因而出現局限。王錫榮 2016 年出版的專著《“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對左聯籌建及其組織系統，做了系統梳理，許多方面都後出轉精，但對左聯盟員的回憶考辨仍嫌不夠，也較少借助必要的政治史料來輔助探討。¹

表面來看，左聯的籌組和制度研究似乎只是左聯研究較為邊緣的一部分（畢竟在文學研究中左聯更多還是作為一個“文學”團體而存在），實則大不然。這由左聯的特殊屬性決定，而左聯的特殊屬性，其實也決定了“左聯研究”的特殊性。長期以來，“左聯研究”並不能很好地區分自己與寬泛的 30 年代左翼文學研究的關係，而這一區分，在進入左聯研究前，應該首先予以分疏。否則，所謂的左聯或左聯文學研究，可能與作為社團組織的左聯，關係幾乎全無。

這主要是由於，左聯固然一度是近於“第二黨”的組織，但畢竟是在國民政府和租界的管轄範圍內活動，左聯的政策變遷和具體命令，並不足以規約盟員的全部行為；即是說，盟員對左聯並沒有人身依附的關係。對魯迅和茅盾這樣的少數左聯盟員而言，他們在左聯組織中享有極高的自由度，左聯一般並不會對他們下達具體命令，反而常向他們彙報、請示工作。而對普通左聯盟員而言，他們的硬性任務，其實更多是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和飛行集會，至於發表文章、創辦刊物，只要不出格，一般也並不干涉。左聯盟員所享有的較大活動空間決定了，並不能籠統地把左聯盟員的行動統一歸入“左聯”的範圍之內；所謂“左聯研究”，也僅應該包含與左聯的政策變遷和組織活動等直接相關的內容，而不應該指向左聯盟員在左聯時期的所有活動。也正因為對“左聯研究”的界定存在混淆，便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認為左聯研究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便異常冷清，一則認為左聯研究一直是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大領域。顯然，第一種概括更加符合“左聯研究”的

1 王錫榮：《“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實情。

倘若劃清了“左聯研究”的合理界限，則不難明白，左聯的組織制度研究，其實是左聯研究幾乎最基礎的環節；而要進入左聯的組織制度研究，不能不依賴對政治環境變遷的細密剖析。而既有從政治環境變遷角度對左聯所做的考察，更多還限於概要性論述，在考察視域及闡釋上也還均有拓寬與深入的空間。這一缺憾其實也直接導致了對左聯文學實踐的認識常不能更進一步。

二、左聯組織史研究的可能性

左聯無疑是高度政治化的團體，在 20 世紀 30 年代常有“第二黨”之稱。在 20 世紀 30 年代前中期，由於上海中共黨組織被破壞殆盡，以左聯、社聯為核心的左翼文化組織甚至一度擔負了維繫中共組織生命的任務。本來是群眾團體的左聯在內部設立了黨支部，接納了眾多與黨組織失去關係的非作家“黨員盟員”。1935 年，以周揚為核心的左聯盟員創建的新文委和 1936 年胡喬木等文總成員創建的“臨委”（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實際上是中共在上海地區僅存的黨組織。以上無不揭示出左聯的活動與政黨活動之間高度的統一性，而這也說明，左聯及 20 世紀 30 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研究須與不可偏離對中共政治活動的考察。倘若進行的是左聯的組織變遷等制度層面的研究，則更是如此。

因此，對左聯的組織研究難免會涉及 20 世紀 20 年代後期至 20 世紀 30 年代中共在上海活動的檔案材料，否則許多問題將難免陷於泥淖。比如，中共在籌創左聯之前成立的文化黨團、文化工作者支部、第三街道支部、文委等組織或機構，它們的成立時間和彼此關係（甚至名稱）至今都眾說紛紜。具體到左聯問題上來，左聯召開的常委或執委會會議以及其他各種會議，是否也有相關檔案材料可供查證？左聯所創辦的內部刊物，至今也不能完全看到。比如左聯秘書處創辦的《秘書處消息》，至今僅賴魯迅的保存而能見到一期；

曾惡化了魯迅與左聯關係的左聯後期機關刊物《文學生活》，亦賴魯迅保存而僅見一期。文總亦然，其機關刊物《文報》，學者孔海珠在檔案材料中尋獲到三期（兩期正刊一期副刊），其中包含不少有價值的內容，但《文報》僅正刊便至少出了十一期。以上刊物因為均係內部出版，對研究處於地下狀態的左聯等左翼文化團體的組織機構、政策變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惜乎或已失傳、或只能看到極少一部分。這給研究無疑造成了巨大障礙。那麼，在相關檔案中，是否還能有新的收穫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問題在於，30 年代的左翼文化檔案資料目前有多少存世？而存世的又有多少處於解禁可發掘的狀態？從現有的利用了此類資料所撰寫的官方成果來看，情況不容樂觀。比如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合編的《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1919.5-1937.7）》，其中涉及左聯的記事條目甚多，雖則對史料來源多半未注出處，但細察可知，絕大部分都源於左聯盟員的回憶，在盟員回憶晦暗不明處，“大事記”也多半晦暗不明；雖然對歧異之處也常有所考證取捨，但明顯可見，判斷的依據仍然並非確鑿的檔案材料，以致其中錯訛並不少見。而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編的《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1919.5-1949.5）》，對左翼文化資料的記事更加含混，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對藝術劇社的成立時間，先說成立於 1929 年 9 月，不遠處又說成立於 1929 年 11 月。¹

眾所周知，左聯資料整理的最大推動力來自國家機器，甚至“文革”結束後左聯盟員紛紛發表回憶文章²，其實也是國家力量有意識推動的結果，其目標並不完全在於保存史料，更在於“撥亂反正”——為被“四人幫”抹黑的 30 年代左翼文壇恢復名譽，確立正統左翼文學的合法地位。當然，這也是國家意志和左聯盟員意志的一次完美結合。為了宣傳左聯，同時也為了搜集

¹ 參見該書第 218 頁、第 224 頁，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 年。

² 1982 年出版的《左聯回憶錄》便是這批文章最大規模的一次結集。

和整理左聯資料，並推動相關研究，國家還專門建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1990年3月2日正式開放）。左聯會址紀念館已經出版了多種左聯資料集和研究論文集，每逢左聯成立十周年便舉行大型紀念和研討活動。因此，左聯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可以推想已經進行得十分深入和徹底，想從國家檔案中獲取全新的左聯相關資料，將極其困難。其實，早在“文革”社會失序時期，各地革命組織紛紛挖掘30年代左翼文壇“黑線”資料，倘若檔案資料中有任何蛛絲馬跡，自然不會被放過。而我們看到，革命組織深挖文壇“黑線”時固然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並對相關當事人進行了數量密集的“外調”，但幾乎很少見到它們利用未公開的檔案資料。這可能並不能說明它們未曾利用，而只能說明，30年代的政治文化檔案中，其實幾乎沒有左聯相關資料。

又如在“文革”結束後，許多左聯盟員重新成為國家領導人，享有較高地位，當他們撰寫回憶錄時，許多人也有條件調用檔案材料，但事實上也並未見任何人使用了這一“權利”。在他們的回憶錄中，仍然充滿了難以查證的片段。夏衍的《懶尋舊夢錄》對左聯有詳盡回憶，然而當面對左聯成立大會的參加人員這一問題時，他引用（並加以駁斥）了的檔案資料竟然來自國民黨方面。¹ 這一狀況，完全由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及共產黨在上海所處的不斷惡化的地下境況所決定。環境的惡劣，使得20世紀30年代許多時段的上海地區中共革命檔案材料，幾乎損失殆盡。試翻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編寫的大型叢書《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其中關於20世紀30年代上海市委乃至中共中央的組織機構及任職人員的記錄，與另一部由學者王健英獨立編撰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相比，尤其在任職人員方面，差別常常判若天淵。而

1 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04頁。

身份更為民間的後者，在不少情況下記述反而更為細緻、準確。¹ 如果具體到上海各區，則資料匱乏的情形更為嚴重。如左翼文人最為集中的上海市閘北區，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該區的區委情況，也多無準確資料可稽。據《閘北區志》載，1933年任區委書記的先後有小周和老王，顯然已經失考。² 其他區的區委書記中，也多有小曾、老師、老曹等人名。³

筆者此前一直以為，目前從事左聯組織和制度史研究的時機尚不成熟，需等待檔案開放到一定程度方可進行。然而隨著閱讀材料的增多，此一觀點逐漸動搖。正如上所述，根據各種情形均足以推斷，現存的檔案資料中不會包含太多與左聯的組織和制度建設直接相關的內容，即便有，一則不知需要付出多少時間和精力才能獲得，二則也難以期待能夠對相關研究有關鍵性影響。所以，安於等待絕非目前從事左聯研究所該取的態度。更何況，現存的左聯相關資料，其實已經足以支撐研究。

確實，現存左聯資料多係盟員在“文革”後的回憶，由於盟員年事已高，同時也由於參加左聯具有極強的政治榮譽性、而相關評判標準仍然具有意識形態色彩⁴，相關回憶難免有含糊不清或彼此矛盾之處，甚至難免存有修飾或偽裝。但是，如果細加統計，可知左聯盟員直接針對左聯的回憶資料已經遠超百萬字，其他對左聯有所涉及的回憶更不可勝數。這批資料以其內容的繁

1 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王健英：《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二著對資料來源幾乎都未注明出處，但後者的初版則有注釋說明，顯示包含大量回憶資料。

2 上海市閘北區志編纂委員會編：《閘北區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第595頁。

3 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第1247頁。

4 最突出的表現或是對魯迅的態度，“文革”期間反魯迅是項極嚴重的罪名、同時也是30年代“文藝黑線”的主要罪狀之一。而在否定了“文革”之後的左聯盟員回憶中，仍謹慎地避免觸犯魯迅，並以表達自己對魯迅的擁護和愛戴為重要內容，而實際上，他們所表達的態度與他們在左聯時期的多半並不一致。當然，這一問題較複雜，不能完全歸因於意識形態的規訓性。

瑣和不確定性使人生畏，然而倘若能妥善利用，並參照以相關歷史檔案材料，無疑也是一座富礦。一個看似不可靠的細節可能無用，但當它們堆積到一起，歷史的脈絡往往就浮現了出來。

第一章

左聯籌建的政治宣傳 動因